

本土经验与世界眼光 周立波与外国文学

邹理 著



本土经验与世界眼光 周立波与外国文学

邹理
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本土经验与世界眼光:周立波与外国文学/邹理著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8

(周立波研究丛书)

ISBN 978-7-208-15339-4

I. ①本… II. ①邹… III. ①周立波(1908-1979)

-文学研究 IV. ①I20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8)第 158678 号

责任编辑 王梦佳

封面设计 陈绿竞

周立波研究丛书

本土经验与世界眼光

——周立波与外国文学

邹理著

出版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发行 上海人民出版社发行中心

印刷 上海商务联西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 635×965 1/16

印张 21.25

插页 2

字数 252,000

版次 2018 年 8 月第 1 版

印次 2018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208-15339-4/I·1759

定价 68.00 元

| 序言

在中国现当代文学批评圈子中，“南周北赵”是一个广为流传的美谈。“北赵”是指赵树理，以及他描写北方农村的作品；而“南周”，就是把湖南家乡农村合作化与当地民风如此绘声绘色地描述出来的周立波。虽然《暴风骤雨》的题材来自东北农村土改，但对《山乡巨变》，无论当代文学批评家的评价还是周立波本人的想法，都被看作是艺术上更为纯熟的代表作。而批评家把周立波看作是湖南作家群的源头、“茶子花派”的核心领袖，以及南方乡土作家的代表，也就是顺理成章的事。

周立波作为现代文学家，他的身份通常被概括为三个：战士、作家与学者，而后者也许是他区别于赵树理和其他乡土作家的重要特色。这不仅是因为他翻译过前苏联作家肖洛霍夫和德国报告文学家基希的作品；也不仅是因为他于1940年代在延安鲁迅艺术学院任教，讲授过外国文学课程并取得轰动式效果；更重要的是，他的作品，无论是《暴风骤雨》还是《山乡巨变》，抑或是那些精美绝伦的短篇小说和粗犷豪放的报告文学，读者总能悟解出一点西式文人的细腻情怀，或体会到西洋的文学风味与结构雅致。无独有偶，前苏联批评家生硬地把《暴风骤雨》中的老孙头与《被开垦的处女地》中的人物进

行对比已是广为人知；有感于周立波短篇小说的惊诧结尾而直呼他“小契诃夫”也不乏人在。

周立波作品毫无疑问与外国文学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这不仅是精神上和艺术上的关联，在日常生活中，外国文学在他的心目中也占有极其重要的位置。在抗美援朝战争期间，他送了几十万本前苏联小说《普通一兵》给渡过鸭绿江的战士，几乎人手一册，用光了斯大林奖金的全部。他最喜爱的一套书是《契诃夫小说选集》，汝龙译，繁体字，竖排版，23册，平明出版社1953年刊行，并在几乎每一本分册上签署了自己姓名。即便在生命的最后时光，他在北京301医院的病榻旁还放着前苏联作家法捷耶夫的《毁灭》和亚历山大·绥拉非摩维奇的《铁流》。那时他为了写一部以三五九旅南下为题材的长篇小说而做热身准备。谁能想到，周立波那篇封笔之作，荡气回肠的《湘江一夜》，如此本土化的语言和题材，竟脱胎于外国的战争小说。

周立波研究自20世纪五六十年代陈涌的批评文字始，迄今已有五十余年的历史。最初的评论当然集中于他所描绘的中国社会变革的历史画卷。《暴风骤雨》出版之后，一时被称作是土改运动的干部指导手册。赵玉林、老孙头也都是农民阶级的出色典型，是社会大变革中的始作俑者。对于这一段历史的进步意义，以及它如何奠定了我们今天伟大国家的物质基础，国内外已有定见与共识，在此也不遑多论了。对于现在流行的那些不顾历史条件一味反暴力的、圣母玻璃心的、小家子气维权私产的、嫌贫爱富对韩老六滥施同情心等种种鼠目寸光、看多了肥皂剧而脑残的观点，实在无言以对。天何言哉，历史洪流仍然滚滚向前。

1980年代是唯美主义盛行的时期，周立波研究回归形式批评和审美研究也不足为奇。湖南乡土特色与湘水神韵，美学话语一时横扫

批评论坛。从农村婚礼的欢声笑语，到禾场上的月光与清风，周立波湖南作品中那些秀美的部分被充分认知和发掘出来。仿佛周立波就是一个被遗忘的沈从文，或者是早三十年出生的汪曾祺，茶子花派与京派的优雅与精致岂止类似而且就是一脉相承。应该说，在《暴风雨》的崇高之外，古典美学的优美范畴在周立波中晚期的作品中确有一席之地。

从黑格尔正反合辩证法看，社会性崇高和乡土式优美都流于片面，它们的结合并融为一体在所必然。我们不难发现，周立波的湖南作品不乏朗朗风骨，而乡村泥土在盖满爹眼里也洋溢着现代化气息。这一现代风格的源头就是周立波饱学经年并烂熟于心的外国文学。邹理的著作开创了这方面研究的先河。她追本溯源，详细勾勒出外国文学对周立波产生影响的图谱，包括思想观念、创作技巧和语言风格等各个方面。她强调了翻译在周立波文学语言表达中的意义，探讨了外国作品对他文学风格形成的影响。她对定位周立波为乡土作家这种注重题材的观点提出质疑，而她的理据又是如此充分，让人不得不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对周立波的位置进行重新思考。

日本批评家柄谷行人在《日本现代文学的起源》中指出，那些最本土的、最当地的、最民族的语言和文学的兴起，正是国家现代化和走向世界性的典型标志。这一点不仅日本近代如是，英国法国立国时期亦如是，中国当然也不例外。这让人想起过去的一句老生常谈，即最民族的也就是最世界的。不过这说的是民族性需更有自己的特色才可以立足于世界之林，如同奇装异服更容易受到商业社会的追捧。柄谷行人的意思远非如此。他说的是民族性就是现代化过程本身，民族语言文化的自觉就是世界性的自觉，本土化就是现代性。周立波与外国文学的关系充分显示出这一柄谷行人的悖论，也就是本土化的性质

只有把它作为全球现代性触角，才能真正理解它的根本含义。

今春三月，邹理博士准备将这部专著付梓出版，嘱我为她写序。然而中国现代文学研究非我所长，可是于公于私这份差事却无法推辞。且不说无论何时何地展卷细读周立波作品都让人心潮澎湃，而中法比较文学泰斗、北京大学著名教授孟华先生悉心指导的这部博士论文，材料是如此丰富，眼界如此开阔且角度这样新颖，拉杂写下几句推荐语也就不怕见笑于大方之家了。无论如何，写序言者的角色相当于舞台上的报幕员，正剧随后上演，精彩的内容一定会伴随着锣鼓喧天。读者不妨沿着周立波的思想发展轨迹寻觅中国现代历史的潮涨潮汐。一旦回顾中国现代化崛起的艰难草创原点，检索记录那一时刻且催人泪下的历史文献，借用朱光潜的口头禅，真如入宝山，决不会空手而还。

周小仪

(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

国际比较文学学会副会长

英国兰卡斯特大学博士)

2018年6月

| 前言

一、本书缘起

周立波（1908—1979）是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一位较有影响力的作家，他一生文学活动丰富，著述颇丰。自1928年始，半个世纪以来，他写下了大量的文艺论著和各种体裁的文学作品，包括散文、诗歌、短篇小说和长篇小说。他的长篇小说《暴风骤雨》和《山乡巨变》奠定了他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小说家的地位。这两部小说不仅在国内被再版多次^①，而且被译成多种语言在世界各地出版发行^②。周立波更是凭借《暴风骤雨》获得了1951年度斯大林文学奖，因而具有一定的国际声誉。

《暴风骤雨》和《山乡巨变》都以中国农村为背景。前者描写的是解放战争时期黑龙江的土改斗争，后者描绘了发生在湖南一个偏僻的山乡——清溪乡的农业合作化运动。虽然这两部小说由于创作时间

① 经查，《暴风骤雨》自1948年首版后，再版了5次，第二版重印了19次；《山乡巨变》自1958年首版后，至今再版了8次。

② 经查，《暴风骤雨》的外文版有：英文版、法文版、德文版、捷克文版、阿尔巴尼亚文版、罗马尼亚文版、日文版、俄文版；《山乡巨变》的外文版有：英文版、俄文版和日文版。

不同，在文学史上分别被划分在“解放区文学”和“十七年文学”中，但是它们都书写了发生在特定时期的中国农村的历史性大变动。这两部以农村为视角、以农民为主要接受对象的作品从风格、形式、语言到审美情趣，无不渗透着乡土气息，与中国传统文化保持着血肉联系。正如茅盾所概括的：“从《暴风骤雨》到《山乡巨变》，周立波的创作沿着两条线交错发展，一条是民族形式，一条是个人风格；确切地说，他是在追求民族形式的时候逐步建立起他的个人风格。他善于吸收旧传统的优点而不受他的拘束。”^①从茅盾的概括可以看出，民族形式只是周立波小说的特点之一，它的另一个特点则是周立波强烈的个人风格。我们不能忽视的一个事实是：周立波在创作这两部小说之前，曾经译介了大量的外国文学作品。他对外国文学的译介与他早期的文学批评活动是同步进行的，而他的报告文学和小说等文学创作则是发生在译介外国文学之后，而且大量地吸收了外国文学的营养。因此，可以说他的文学创作与外国文学结下了不解之缘。近年来，学界已经注意到了周立波的创作受外国文学影响这一现象，但是还没有研究者对此进行过深入系统的研究，特别是对他作为译者的关注和研究还远远不够。迄今为止，还没有一篇专门讨论周立波翻译的论文，他的翻译与创作之间的关系也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有鉴于此，本书将把研究重点放在周立波对外国文学的译介以及他与外国文学之间的深层关系方面。

二、课题史

周立波研究始于20世纪30年代，至今已有80余年，迄今为止

^① 茅盾：《反映社会主义跃进的时代，推动社会主义时代的跃进》，载《人民文学》，1960年8月。

的研究成果大部分可归纳在中国现当代文学的框架内。最早评论周立波作品的文字是1938年7月汉口《全民周刊》发表的罗之扬评周立波报告文学《晋察冀边区印象》的文章，文章指出周立波的报告文学写出了“战斗与自由之中国”。

20世纪五六十年代评论界对周立波的研究集中在他的三部长篇小说《暴风骤雨》《铁水奔流》和《山乡巨变》以及他在同时期创作的一批短篇小说上。1948年《暴风骤雨》出版后，评论很多。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评论是署名“芝”写的《推荐〈暴风骤雨〉》^①。作者从新人形象、革命主题和民间语言等方面对小说进行了肯定。1955年《铁水奔流》出版后，许多评论文章都集中在小说的主人公“李大贵”身上，认为作家写出了工人阶级先进分子的形象。五六十年代学界对《山乡巨变》的评论出现两种倾向：一方面肯定周立波突出的个人风格，这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黄秋耘在1962年写的《〈山乡巨变〉琐谈》：“总的来说，《山乡巨变》的作者在艺术追求上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以其独特的艺术风格、耀目的艺术光彩、对人物的性格和心灵细致的剖析、对农村新生活富有诗意的描绘，开拓了文学创作的新境界。”^②另一方面，也有人从意识形态的角度对周立波的艺术风格提出了批评：“作者表现了一种虽然还是刚刚冒头的、但却是值得注意的倾向：那就是过分地追求艺术技巧。……我觉得这种单纯从艺术技巧上下功夫会为创作带来损害。”^③从上述评论可以看出，五六十年代大部分的研究者都看到了周立波在《山乡巨变》中表现出来的鲜明的个

① 芝：《推荐暴风骤雨》，载《生活报》，1948年5月11日。

② 黄秋耘：《黄秋耘文学评论选》，湖南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30页。

③ 肖云：《对〈山乡巨变〉的意见》，原载《读书》，1958年8月27日，载胡光凡、李华盛编：《周立波研究资料》，第398页。

人风格，虽然有少数人从审美的角度对此进行了肯定，但在反右斗争激烈开展的文学批评氛围里，许多评论者是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标准来评判周立波的作品，认为他过于注重艺术风格而损害了作品的政治意义。

1980年以后，评论界不仅关注他的作品，而且开始对作家本人产生了浓厚的兴趣。80年代的周立波研究趋向于综合性。1985年庄汉新撰写的《周立波生平与创作》，1986年胡光凡所著的《周立波评传》以及1988年出版的《战士、作家、学者——首次周立波学术讨论会论文选》对周立波的生平、文艺思想、艺术风格与创作成就进行了综合、系统的研究，标志着周立波研究达到了一个高峰。

1986年以后一段时间，文学评论界开始反思与政治结合过于紧密的“十七年”文学，对它们大多持否定的态度。在这一背景下，周立波的《山乡巨变》及其在故乡创作的短篇小说也难逃被批评的命运，一些评论认为他的作品有按中央文件图解生活的公式化和概念化倾向，然而大多数人仍然肯定了这些作品的艺术风格。有的评论家认为周立波从“文章贵乎自然”这一审美观点出发进行探索，他的突出特点在于对生活的独立见解和在艺术上的独创精神。^①

除此之外，文学史著作对周立波及其作品都有所记录，各高校自编教材都以较多的篇幅或独立的章节对周立波及其作品进行了阐释。20世纪80年代的文学史主要从思想和审美的角度对周立波进行了正面的评价。90年代以后，评论界对周立波作品的艺术价值和他整体的文学史地位作了新的发掘和评判，出现了从多元化角度解

^① 参阅李景彬：《周立波代表作（前言）》，黄河出版社，1989年，第9页。

读作家及其作品的态势。新世纪的文学史著作不再纯粹从政治或者审美的角度来解读作家及其作品。陈思和的《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2006年)专门讨论了《山乡巨变》的“民间文化形态”因素。严家炎主编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2010年)则从“农村题材”与“乡土文学”的区别入手,探讨周立波小说的个人特色,认为周立波“在赵树理和柳青之间寻找到‘第三条道路’”,是“现代‘乡土文学’和当代‘农村题材’之间的一个作家”。^①这种新的研究角度,拓展了研究空间。

20世纪90年代以来还出现了与周立波相关的学位论文,其中有两部博士论文——李扬的《现实主义的现代转型——“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研究》(1993年)和余丹清的《周立波新探》(2007年)。李扬的博士论文专辟一章从现代性和话语的角度分析了周立波的小说《暴风骤雨》,他认为小说围绕着存在的两种声音展开:一种是农民的声音,主题是农民的翻身解放;而另一种声音则是“现代”的声音,它通过工作队的肖队长代言。余丹清则把周立波放在整个中国乡土小说链上进行研究,从作家的个性心理出发,研究他转向的种种原因和心路历程。这是笔者到目前为止看到的唯一一篇专门研究周立波的博士论文。该论文关注作家创作的心理过程,把周立波研究向更深层次推进了一步。另外,李存光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与〈暴风骤雨〉的人物形象研究》(2001年)、张远波的《干部、游子、作家与三重视野》(2003年)、褚宏芎的《试析“十七年”农村题材长篇小说中伦理意识的转变——以〈三里湾〉、〈山乡巨变〉、〈创业史〉、〈艳阳天〉为例》(2007年)等一批硕士论文从历史语境、文化传播、伦理

^① 严家炎主编:《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高等教育出版社,2010年,第61页。

和人物形象等角度对周立波的作品也进行了全新的解读。

周立波的《暴风骤雨》《山乡巨变》《山那面人家》等作品还曾被翻译成英、德、法、捷克、俄等多国文字，同时也伴有相应的评述。苏联文学家兼翻译家 B.卢得曼娜（ВлРудман，1910—1954）翻译了《暴风骤雨》，并在译者序言中对该作品进行了评介；B.克里夫佐夫（В.Н.Кривцова，1912—1983）翻译了《山乡巨变》正、续两篇，并分别写有长篇序言《周立波及其长篇小说〈春到山乡〉》与《〈山乡巨变〉续篇俄译本序言》，对该作品从内容、情节、到人物形象进行了描述与概括；日本学者安岛彬翻译了《暴风骤雨》，并著有研究文章《暴风骤雨》，收录在《中国名著鉴赏与批评》^①一书中。此外还有一些专门的研究，如日本学者阿赖宏耶撰写了文章《周立波创作简论》^②；林曼叔在《中国当代文学史稿 1949—1965》^③中也对周立波进行了论述。以上这些外国学者和汉学家高度评价了周立波的文学成就，他们的工作重在对周立波的作品及其艺术风格进行介绍。

上述周立波研究都是在现当代文学的框架内进行的，他们从各个角度对周立波进行阐释和解读，推进了对周立波的整体研究，但是他们都未提及周立波与外国文学的关系。最早将周立波与外国文学联系起来的当属唐弢，他对周立波短篇小说做了如下评价：“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作者是有意识地在尝试一种新的风格：淳朴、简练、平

① 安岛彬：《暴风骤雨》，载东京大学中国文学研究室编：《中国名著鉴赏与批评》，东京劲草书房，1962年。

② 载王驰主编：《战士、作家、学者》，湖南文艺出版社，1988年。

③ 林曼叔著：《中国当代文学史稿 1949—1965》，法国巴黎第七大学东亚出版中心，1987年。

实、隽永。作者余味无穷地赞颂了农村新气象，提供了安详轻松的小幅。阿·赛罗夫描写的十月革命名画《冬宫攻下了》，一个赤卫队员和他的同伴老年士兵，两个人站在散乱着弹片和碎石的台阶上，点燃起战后的第一枝烟卷，那么安详、那么舒畅。周立波的短篇也有类似的情调。他为自己的艺术开创了新的天地，建立了新的风貌。”^①他认为周立波的短篇小说与阿·赛罗夫的名画有相似的情调，遗憾的是他还只是停留在感性认识的阶段，并未就此现象做进一步的分析和探讨。

1985年4月，李庆国发表了题为《周立波与外国文学》的论文，首次对周立波与外国文学的关系进行了分析。文章的前半部分梳理了周立波翻译外国文学、介绍外国作家作品的历史，后半部分则将周立波的《暴风骤雨》与肖洛霍夫的《被开垦的处女地》进行对比，比较了两部小说的写作题材、故事情节、人物形象、景物以及心理描写等方面的异同。作者认为两部作品有相似性是因为周立波借鉴和汲取了肖洛霍夫的艺术特点，但是他并非生硬地模仿，他在创作中也融入了自己的创造，因此形成了他独特的个人风格。该论文虽然在对比两个作家的作品时显得有些简单化，但是它开了从比较文学的角度研究周立波的先河，为周立波研究引入了一个新视角。

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有学者开始研究基希（Egon Erwin Kisch, 1885—1948）对周立波报告文学的影响。李仕中的《基希的影响与周立波报告文学的历史地位》和丁晓原的《周立波对报告文学名著的翻译与研究》都介绍了周立波对基希的《秘密的中国》的翻译，也注意到了基希对周立波报告文学创作的影响。他们把研究重点

^① 唐弢：《风格一例——试谈〈山那边人家〉》，载《人民文学》，1959年7月号。

放在周立波对基希报告文学观的总结与实践上。这是对周立波与基希的报告文学关系最早进行的研究。但这两位学者在探讨周立波的翻译时均未能进行译本研究，也未探讨基希的作品对周立波创作的影响，而且他们对当时的历史文化语境的研究也都不够深入，因而有待进一步深化。

新世纪以后出现了一批从比较文学角度研究周立波的论文。其中中华济时、皮民辉、吴格非等从周立波的整体作品出发，研究周立波创作与外国文学之间的关系，王竹良则将重点放在周立波与肖洛霍夫的关系上。他们的研究重在史实的介绍，所得结论与1985年李庆国所作的论文相似。另有蒋芳的专题研究：《周立波对巴尔扎克在中国传播的贡献》，文章通过周立波对巴尔扎克的阅读和他在延安鲁艺授课时对巴尔扎克及其文学作品的讲解，从艺术的真实观、典型化以及写作取材等方面切入，分析周立波对巴尔扎克文学思想的接受。该论文是笔者目前见到的唯一一篇选取周立波鲁艺授课进行研究的论文。

还有一批朝鲜留学生在硕士论文中将周立波与他们本国的作家作品进行比较。比如金宽雄的《前社会主义阵营文学中的农业集体化题材小说比较研究》（2007年）、崔盛学的《周立波的“暴风骤雨”与李箕永的“土地”比较研究》（2007年）和安太顺的《中朝土地改革小说中的人物形象比较》（2007年）。他们的论文对两国的农业集体化与土地改革题材小说进行了对比，重点比较了周立波的《暴风骤雨》与朝鲜作家李箕永的《土地》。他们从两国作家所处的时代背景、作家经历、文学思想、创作目的等入手，考察中朝两国作家、作品的异同。虽然周立波的《暴风骤雨》在创作时间与主题上都与朝鲜作家的创作相近，但这些研究未能揭示出两者间的事实联系，因此这种对比显得比较生硬和牵强。

不可否认，上述研究对周立波在中外文化交流与文学翻译中的贡献做了不同层次的总结与探讨，丰富了对周立波的整体研究。但他们共同的问题是不够系统和深入，没有揭示出周立波与外国文学之间的深层关系，因此在该方向上的研究还有进一步拓展的空间。本论文恰希望在这个方向上有所作为。

三、周立波与外国文学的关系

根据现有的周立波生平资料，笔者认为周立波与外国文学的关系，可按其人生轨迹大致分为上海、前线、延安鲁艺和鲁艺之后四个阶段。^①以下将逐一做这一史实的勾勒。

1927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之后，怀有革命理想的青年周立波在家乡益阳无法立足，1928年春，他远赴上海，开始了他革命与文学创作的一生。初到上海，他便发奋自学英语，并且开始广泛地阅读外国文学作品：欧洲古典名著、19世纪的浪漫主义代表作品、苏联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作品以及弱小民族的进步作品和某些西方现代派作品等。为了生计，他开始了外国文学的翻译。1934年周立波加入左联后，他翻译的主要是进步的文学作品。从1930年他的第一部翻译作品问世到1937年他离开上海，这段时间他共翻译小说七篇，其中四篇是短篇小说，有三篇是以连载的方式刊登在报刊上^②，另有一篇以专著形式出版。另有两部长篇小说和一部报告文学也以专著形式面世。此外他还翻译了文学论文三篇、书信一封、散文

① 相关史实如未特别注明，均参阅胡光凡：《周立波研究资料》，湖南文艺出版社，1983年；庄汉新：《周立波生平与创作》，光明日报出版社，1985年。

② 连载在报刊上的短篇小说是《著名的跳蛙》《寄宿舍》和《贵客》。

一篇。^①在翻译的同时，他还对日本、波兰、西班牙等国家的文学现状、主要流派的代表作家及其作品，特别是新兴的进步文学的动向作了概括的介绍。这些介绍性的文字大多发表在上海《时事新报》《大晚报》《申报》和《生活知识》等报刊上。除此之外，他还常常在一些享有国际声誉的外国文学家的诞辰和忌日，发表一些短小精悍、文情并茂的纪念文章，把他们的生平和文学成就介绍给中国读者。周立波在上海的十年间，一共发表外国文学评介文章 23 篇，翻译了近百万字的文学作品。

1937 年“七·七”事变之后，在上海的许多左翼文艺工作者响应党的号召，撤离上海，前往延安。1937 年 10 月，周立波在去延安的途中临时受命，作为随军记者兼任英语翻译陪同美国进步作家史沫特莱（Agnes Smedley, 1892—1950）去前线访问。他们到达八路军总部后，随着总部一路南下。在长达两个多月的时间里，周立波陪同史沫特莱会见了共产党、八路军的许多重要领导人，包括周恩来、任弼时、朱德、彭德怀等，了解了许多八路军英勇抗日的事迹，史沫特莱后来写下了《中国人民在反击》（*China Fights Back*）、《伟大的道路》（*The Great Road*）等著作，让全世界，特别是欧美各国人民了解了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八路军动员人民，与日寇浴血奋战的情况。

陪同史沫特莱访问八路军的任务结束后不久，1937 年 12 月底，周立波再次作为翻译陪同时任美国驻华使馆的参赞卡尔逊（E.F. Carlson, 1896—1947）去晋察冀边区实地考察八路军抗日的情况。卡尔逊还有一个特殊的身份——他是罗斯福总统的前副卫队长和私人朋友，

① 详见附录一。